

语文教学 的改革与实践

冯起德 著



海南人民出版社

语文教学的改革和实践

1

馮 起 德

海南人民出版社

语文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冯起德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文昌县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4,000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书号：7362·25 定价：1.30元

序

我认识馮起德老师已二十余年，对他的語文教育思想和語文教改实践有所了解，然而，当我拜讀到他的《語文教学的改革和实践》一书手稿时，我竟禁不住自責起来，深感自己原来的认识太淺、太少了。尽管馮老师出于厚意，嘱我为該书写几句话，其实，倒是給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語文教学方面多，綜合性強，难度很大，須下扎实的功夫才能見到效果。馮老师从事語文教学与研究几十年，以功底扎实称著。教材是教学的依據，教材的深度、广度理解得如何，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馮老师深知其中之道，因而研究教材細琢細磨，从整体到局部到細节，从語言表达到思想內容，都深入底里，有独特的覓解。书中十多篇教案教学問答、备

课筆記尽管涉及到各种体裁的文章，但都反映了上述的特点。

語文教学充滿時代的气息方能激发学生強烈的求知欲，使語言文字充滿活泼的生命力。为此，在實踐中致力改革，努力創新甚为重要。馮起德老师对語文教改的新信息非常敏感，他不仅以极濃厚的兴趣关注教改的動向，而且从理论上进行考察，审慎地开展研究，对閱讀能力結構、课外渠道开辟，以及語文质量測試等等問題作了精彩的闡述和有益的探索。文中闡述語文教学中某些重要問題时絕非就事论事，而是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現實背景之中，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較分析，言之有據，言之有理，給人以启迪。

课堂教学在培养学生产听、讀、說、写能力，在发展学生智力方面起重要作用，从事語文教学實踐或进行語文教学研究的同志无不对此傾心注血。馮起德老师当然毫不懈怠，不管是自己教学，还是听別的老师的课，都是悉心研究，摸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規律，探求調动学生产学习积极性的科学方法。而研究

他人的教学，更是善于从紛繁中抓住精髓，
要言不煩，一語中的。

語文教学改革的天地十分辽阔，理论上的探索也仅仅是起步，热爱語文教学、富于事业感的馮起德老师必将奋然而前行，在其中作出更多的貢献。

于漪

于上海

一九七六年十月

前　　言

1957年整风，我当时23岁，在一个中学里做团委书记，兼教一点政治课。由于少年气盛，不知世故，得罪了当时的校长兼代理支书，差一点划为右派，幸亏出身好，工作积极，而且还是区人民代表、团区委委员，总算没戴帽子，作为“右派边缘”而留党察看一年。漏网右派自然不能做政治工作，于是改行当语文教师，从此跟语文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当语文教师是十分困难的，一没有念过大学，二不懂语文教学的规律、方法，只凭中学时代对文学的爱好和老师的榜样是远远不够的，好在过去“亲密无间”的同志，“情同手足”的学友和初恋的情人都弃我而去，人际的交往降到最少的程度，我有充分的时间倾注自己的心血。晚上，一盏孤灯，母亲为我缝衣服，我埋头在书本里。多少个日日夜夜，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包揽了所有家务，我为语文付出了全部热情。尽管我的心情是凄苦的，但想到自己还是个党员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将来总还有希望；至于希望是什么，何时能到来，我都不知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有时我的悲愤臻于极点，真想了却自己的一生，但回头瞥见沉睡中的白发苍苍的母亲，低头沉思那些给我温暖催我前进的同志和朦胧中的希望，以及我童年时代拾蔗、卖报中造就的“贱骨

头”，我终于没有化为粪土。

1980年10月我有幸调到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这才有了充裕的时间让我写东西。六年来，我写了几十万字；现在奉献于各位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从中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一些教例有重复之处，这是应该向读者致歉的。我要感谢出版社的同志，他们冒着亏本的风险，为我这个小人物呐喊，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感谢于漪同志在百忙中为我写序言，她的话我是做为勉励来听的，我没有做这得么好。我之所以请她写，因为她的道德和文章都是我的榜样。

感谢在我危难中赐我“微笑”、给我鼓励的同志们，并告慰母亲在天之灵，没有他们，这本小册子是写不出来的。

书名应为《语文教学知识录》，可惜广告早已做出去了，要改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的名字连同它的内容，我只有等前辈和读者的批评了。

作者

1986.10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一、教学思想

关于文道之争	
——语文教学历史一瞥.....	(1)
兴趣、注意及其它.....	(9)
阅读能力的基本结构.....	(14)
说“精讲”	(22)
运用兴趣规律，培养学习兴趣.....	(27)
开辟第二渠道，为“三个面向”服务.....	(39)
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特点和趋势.....	(43)
国外语文教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73)

二、教学经验

提高课堂教学45分钟效率的管见.....	(81)
严谨活泼与精深开阔	
——杨墨秋的教学特色.....	(88)
撒播创造的种子	
——特级教师于漪教学经验谈.....	(90)
试谈于漪的文体教学.....	(99)

我们对“教读法”的认识.....	(107)
说明文读写举要.....	(113)
学生作文不能写“阴暗面”吗?	(118)

三、教学实践

《夜走灵官峡》教案.....	(121)
《南州六月荔枝丹》备课笔记.....	(129)
《山地回忆》教学问答.....	(135)
《西湖漫笔》教学问答.....	(141)
《狂人日记》备课笔记.....	(146)
《阿Q正传》备课笔记.....	(157)
《杨修之死》教案	(166)
《订鬼》备课笔记.....	(174)
《书博鸡者事》备课笔记.....	(182)
《项链》备课笔记.....	(191)
《柏林之围》备课笔记.....	(197)

四、教学测试

1983年高考语文试题的再认识.....	(206)
1985年上海高考语文试题谈.....	(215)
高中毕业班语文复习之我见.....	(220)
《1986年上海市普通高考语文试题》读后感.....	(226)

第一部份 教学思想

关于文道之争

——语文教学历史一瞥

一九五九年六月《文汇报》发起“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一九六一年一月，该报又组织“怎样教好语文课”的笔谈。第一次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没有作结论而暂告段落，第二次历时一年左右，最后以社论形式发表了一篇总结。两次讨论的参加者遍及全国各省市，除广大语文教师外，还有社会各方面人士，有的地区、学校还专门组织讨论会、座谈会，影响很大。与之同时，《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也组织类似的讨论和争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大论辩。

问题和分歧

解放初期，语文教学偏重于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语文知识的教学和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同政治形势有关。一九五三年《红领巾》观摩教学以后，强调所谓“挖掘语言因素”，语文知识的传授得到了重视，但并不系统，又偏重于语法知识。一九五六六年汉语、文学分科，开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语

言、文学知识的教学。但又忽视了语文能力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也没有妥善解决。这同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没有明确有关。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语文教学在反对“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及批判“厚古薄今”的形势下，学生走向社会，参加政治运动，开展“万首诗”等写作活动。于是，语文教材成了社论、时文、和民歌的凑合。学生在接触社会实际的过程中，虽然开拓了眼界，增强了活动能力，但总的来说，读写能力缺乏有计划、有目的的严格训练，语文知识质量降低了。一九五九年，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强调了基础课程和系统知识的重要性。

解放十年，语文教学中这种摇来摆去的现象，使广大语文教师感到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教学实践迫切需要回答：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这两个方面究竟是什么关系？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方法又如何？语文课到底怎么教？

《文汇报》和其它报刊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文道之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在历时一年多的讨论中，对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认识，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文为主、认为语文知识教学是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或主要任务。理由是一门学科的目的任务必须依据学科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否认这种特点，也就取消这门学科的本身。如上海地区讨论中，有的认为：“教学生‘学会了文’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学通了道’是自然结果。”

有的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各科教学的共同任务，而各科又有其自身的特殊任务，语文课必须通过语言文学因素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离开了语文因素，就不成其为语文课。有的同志把语文教养比喻为“经”，思想教育比喻为“纬”。没有“经”，“纬”再牢固，也不能织成布；思想教育再强烈，没有语文修养，也难以完成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天津河西区教育科学研究会在文章中认为：语文课应该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要任务，适当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语文课虽然政治性很强，但它毕竟是一门文化课，不是政治课，语文课不能因为要政治挂帅，就把政治思想教育任务定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

第二种意见：以道为主，认为语文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由为：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教育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语文学科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文汇报》举行的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语文课总是以语言文学作为阵地来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文章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服从于一定的思想政治的，而分析文章的思想政治内容正是语文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还有的说：语文教学应该以教育目的为主，错别字、病句不是原则问题，教养只是手段，而教育才是目的。天津市有的教师认为：“虽然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时候，不能离开语文知识的教育，但这是教学的手段，而不是教学的目的。”

第三种意见：文道并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两者都重要。北京地区讨论中，有的说：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不是什么首要次要的问题，而是二者应紧密无间，结合进行。”天津有的同志认为：“语文知识教育

与政治思想教育的关系，决不是‘你消我长’的关系，也不是‘你主我次’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水乳交融，紧密无间，偏重了那一方面也是不妥当的。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固然不对；但是，抱着单纯实用的观点，把语文课仅仅看作是一种教会使字、读书、写文章的‘工具课’，那也是不对的。”

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还有一部分表示了如下的看法：双重目的不应该有主次、轻重之分，但在一定时期可以强调某一方面。上海有的教师认为：有的同志对强调思想教育有意见，我觉得不必过多地责备过去。因为过去不强调这一点，就不能扫除语文教学上陈旧的观点。当前语文教学上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不少同学语言文字基础知识差，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一下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多给学生一些基本训练也是应当的。上海有些语文教师指出，过去重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忽略了基础知识的教养，在教学过程中，前者占了四分之三的比重；后者只占四分之一。现在必须矫枉过正，使其比重平衡，不妨把教养任务看得更重一些。

结 论 和 启 示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文汇报》以《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为题发表社论，作为两次讨论的总结。文章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及语文教学的规律方法三个方面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文章不仅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思想上统一了对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认识，而且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为一九六三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制

订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文章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工具，一句话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文章强调：“使中、小学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是一项何等重大的政治任务！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就是语文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语文教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最重大的责任。”

社论作者指出语文是工具，强调掌握语文工具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而肯定语文教师教会学生掌握语文工具的政治意义。这样的见解，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可贵的，而且对以后的语文教学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者没有突出语文这个工具的本质属性：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语），也没有明确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一九六三年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弥补了这个不足。对语文的社会交际功能和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作了鲜明的，简洁的表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大纲的教学效果是好的。但是，由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左”的思想影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语文和语文学科被不适当夸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被人为地加重了，这给语文学科带来沉重的负担，不仅削弱了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累赘。

文章接着论述语文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

系：“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课文，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所学的文表达了什么思想，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懂得作者是如何运用语文这个工具来表达其思想的，并通过基本训练，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够培养、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密切不可分离，在统一的教学过程中同时完成的。”据此，文章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该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祖国的语文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和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

应该说，社论对于语文学科的“文”“道”关系的分析和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概括都是正确的。一九六三年教学大纲和一九七八、八〇年教学大纲，对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提法，同这篇社论相比较，其理论原则和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一九六三年提得鲜明、简洁，一九七八、八〇年提得完整、稳妥，而《文汇报》却是提得最早、最新。这说明，对于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早在六十年代初，经过这场全国性的大论辩，在认识上大体是统一了的。但在实际贯彻执行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影响和“一言堂”的偏颇，造成语文教学在文道关系上老是摇来摆去，倚轻倚重的局面，使得广大教师感到无所适从、难以驾驭，十年内乱中自当别论。即便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还有这种情况，如一九七八、七九年两年因高考试题而引起的“题海”，离开具体的文章，离开思想教育和知识教学，孤立地搞单项训练，形成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上的混乱。又如一九八〇年叶圣陶先生重提“听说读写都重

要”，这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一九五〇年叶老曾在初中语文课本《编辑意图》中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未能实现。对于这样一个涉及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重大问题，在报刊上进行学术讨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该积极组织典型试验，深入调查研究，然后加以总结推广，以求提高教学质量，这才是科学、慎重的态度。可是在“赶浪头”思想作祟下，不顾现行教学大纲和教材以读写训练为体系的特点，漠视现有的师资条件和教学设备，到处鼓动，遍地烽火，一哄而上，一拥而起，搞得广大教师手足无措、无所适从，这不仅无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违背叶老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这些现象充分表明：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尽管在理论上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在实际教学改革中，形而上学思想，不科学的态度仍然会应运而生，各种唯心主义的东西照旧会沉滓泛起。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任何改革，“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工作要细致”，唯独语文教学改革可以超然于世，另有捷径？！

社论的最后部分简述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和正确的教学方法，它说：“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这是写作的一般原则。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则。批判地继承是对待文化遗产的原则，这些原则同语文学科有相联系的一面。但是语文教学的任务和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整理研究文化遗产的任务是不同的，不能把这些原则机械地搬到语文教学领域中来。语言是“手段”、“形式”，学会这个“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掌握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